

走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东方学陷阱”

——基于对“萨义德悖论”的批判

宗益祥 刘艺璇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曾具体分析西方媒体如何利用“东方学”话语对中东地区进行“他者塑造”,进一步揭露西方利用支配知识体系不断强化自身文化霸权与政治经济控制的现实。萨义德旨在反抗西方知识霸权的创新道路为当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独特的镜鉴。但应警惕萨义德理论背后的多元文化主义陷阱,因为文化相对论正是西方主流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的同谋。唯有坚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避免“萨义德悖论”,从而建构起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新时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 东方学陷阱;“萨义德悖论”;多元文化主义;新自由主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26)02-0020-10

2026年5月17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在讲话中,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明确要建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三大体系,为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和根本任务。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论述反映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要求,强调要从知识生产的根源上体现自己的主体性、原创性,实现文化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出了一系列优秀成果,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持,而且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①然而,“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问题仍然存在一些症结和误区:比如为了“去西方化”而刻意强调“中西对立论”,乃至简单否定“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或者脱离了新中国新时代的历史逻辑,导致“自主性”之建构简单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晚清民国的想象当中;还有的研究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时,仍然不自觉地陷入西方中心论所预设的理论情境与问题框架,因此无法真正实现学术“自主性”。那么,何谓真正的超越西方中心论的“自主知识”?立足同样被西方视为“东方”的中东国家,著名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为解构西方文化霸权、推动中东知识自主生产提供了难得的经验与教训,成为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知

[收稿日期] 2025-12-17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委托项目“美对华认知战的技术构架、话语逻辑及其应对举措研究”;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大基地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宗益祥(1989—),男,安徽天长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艺璇(2000—),女,山西忻州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第九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论坛”与会代表:《关于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倡议》,载《学习与探索》2025年第11期,第177页。

识体系的一块“他山之石”。

如今,美式普世价值观和现代化道路标准仍然占据话语霸权,为美国的国家政策与对外军事干预提供合法证明。在以色列与美国最新提出的所谓“加沙和平计划”中,“加沙将由一个技术专家型、非政治性的巴勒斯坦委员会临时过渡治理”,并要求“哈马斯和其他派系同意不以任何形式直接、间接地参与加沙治理”^①。显然,这一方案排除了巴勒斯坦民族自治的可能,并使得加沙地区面临再次殖民化的严重风险。然而,西方主流媒体在相关报道中有意遮蔽巴以冲突与殖民主义的本质关联,反而不断强调国际社会对于解除哈马斯武装力量的赞成态度,并将“加沙和平计划”定义为对加沙地区的“援助”。这种颇具偏向的报道建构起特定的拟态环境,不仅以“知识”之名蒙蔽西方民众,而且服务于全球范围内隐秘扩张的思想殖民,这呼应了当年萨义德的诘问:

“如果它掩饰的部分比报道的部分还多,那么我们要到何处——或者应该说是如何——去寻求既不鼓吹未来的权力之梦、也不唤起旧日恐惧偏见的讯息?”^②

巴以冲突只是当今世界复杂局势的一个缩影,如何理解它或者以何种知识体系阐释它成为国际舆论场上的焦点之一。面对这种历史情势,我们不应忽视萨义德推动中东地区知识自主生产的努力。在其“中东研究三部曲”中^③,萨义德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作为一名美籍阿拉伯裔知识分子,萨义德始终关注中东地区,尝试从中寻求一条超越西方知识霸权的崭新道路——新闻报道即为他的重要切入点。借助法农、福柯和葛兰西等人的理论资源,萨义德深刻剖析了“知识、诠释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以经验案例巩固了“东方学”理论范式的说服力。在我国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下,萨义德立足第三世界旨在突破西方知识霸权的创新经验值得借鉴,但我们仍需追问:萨义德式自主知识道路是否成功?基于“东西对立”的东方学批判体系如何直面“文化相对论”的责难?进一步而言,如何避免走向自我东方主义的“萨义德悖论”?这种悖论是将自主知识体系偷换为西方世界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而后者是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的共谋。

一、萨义德的东方自主知识道路

在英语世界中,“covering”一词一语双关,既为“采访”,也为“掩饰”。萨义德借此隐喻自己的研究主题:西方主流媒体如何在“报道”中东地区的同时“遮蔽”它。换言之,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了“什么”,又遗漏、排除和掩饰着“什么”——这种新闻报道的偏向性和选择性不仅“再现”着东方,同样也“再现”着西方。萨义德嘲讽道,这两项因素之间的关联性最终会使得两种揭露不相上下,“后者的具体性与趣味性还略逊前者一筹”^④。因此,萨义德的目的不只在于从非西方的视角理解真实的中东地区,更在于借此剖析西方知识体系与帝国主义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

20世纪70年代,兼具阿拉伯裔、美国公民、学院派知识分子三重身份的萨义德目睹了整个西方世界对中东地区的紧张反应。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与1978年伊朗革命先后引发两次石油危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严重衰退的导火索。以阿拉伯国家为主要成员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① 《特朗普加沙和平计划全文公布,含20点内容》,载凤凰网, <https://news.ifeng.com/c/8n3t1yyGMMf>, 2025年10月30日访问。

^② [美]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阎纪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220页。

^③ 萨义德的“中东研究三部曲”包括《东方学》《巴勒斯坦问题》和《报道伊斯兰》,分别出版于1978年、1979年和1981年。

^④ [美]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阎纪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对石油的控制权、资本主义国家持续性的通货膨胀都造成了西方社会的动荡不安。在西方主流媒体连篇累牍的新闻报道中,以伊朗为代表的中东地区正在对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发起挑战:“一种似乎颇受欢迎而且反帝国主义的新秩序,在挣扎中诞生”^①。伊朗从“可靠的盟友”变为美国高度关注的“可怕的竞争对手”。萨义德敏锐注意到了这一反常现象。他认为,这些“充斥着激情、防御性偏见,甚至是强烈反感”^②的新闻报道遮蔽了真实的中东。西方媒体全然不顾中东地区内部的复杂现实,单独用同一个宗教概念吞没了多样化中东地区的各个层面,“将它们全部化约为一种特别恶毒而且欠缺思维能力的本质”^③。中东被西方媒体一致呈现为会对西方产生实质性威胁的大本营,并与一系列负面形象画上等号。

这种根据东方在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被萨义德概括为“东方学”^④。萨义德指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东方学成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⑤作为标准本身,“西方”意味着先进与文明,“东方”则代表堕落、邪恶又混杂着神秘的未成熟状态。这种“东方学”长期存在于西方公众的文化潜意识中,形成了一整套将中东地区再现为“危险的他者”的共识机制。那么,这种共识机制何以产生又如何运作?萨义德从“知识、诠释与权力”三者间的关系出发,尝试揭示隐藏于“企业—政府—大学”关系网络背后的主导性力量。

首先,萨义德将西方媒体对中东地区的“他者化”呈现界定为“意志与诠释的行动”。在缺乏有关其他文化的直接经验时,公众会选择接收来自大众媒体等文化机构的诠释与意义,并将其作为一种间接证据来获得相关知识。然而这种从诠释到知识的直接转化是极为危险的,因为公众通过新闻报道所获取的知识并不纯粹和客观,而是西方媒体在信奉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逻辑绝对正确的普世前提下,基于种族优势和道德优越感对世界其他地方做出的主观理解。结合政治情势来看,对中东地区的新闻报道都是出于政治上的迫切需要,他们只有与石油、伊朗、阿富汗或恐怖主义等有价值的新闻议题联结在一起时才会进入美国公众视野,那些不具备这类型新闻价值的部分则遭到忽略或扭曲。崇高的国家认同感融入了美国的整个历史文化传统,使得新闻媒体在实践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其为界限,将世界泾渭分明地划分为“我们”和“他们”,这种单一化和对立化再现“创造出一种冲突的政治情势”,构成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势不两立^⑥。

接着,萨义德借助福柯的“话语理论”剖析了这种“他者化”诠释在西方成为主流话语的原因。福柯指出,“话语是由一组符号序列构成的,它们被加以陈述,被确定为特定的存在方式”,提供了人们讨论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和社会制度的观念、图式与实践,^⑦而权力决定了何种话语能够成为“真理”。萨义德发现,在有关中东地区的讨论中,如黎巴嫩内战、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的冲突、阿

① [美]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阎纪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② [美]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阎纪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③ [美]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阎纪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④ [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第3版),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6-9页。

⑤ [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第3版),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4页。

⑥ [美]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阎纪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58-60页。

⑦ 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载《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第121-129页。

富汗政变等,这些对后殖民时期国家真正重要的事情并未得到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相反,西方的专家大多对真实的中东地区知之甚少,却因国家利益的引导、新闻媒体的需求、企业经费的赞助等原因而大肆生产有关中东的知识。“方法学意识的忘却与市场的存在”使得专家的知识生产以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为出发点,^①大众媒体则负责散播由恐惧和无知组成的刻板印象;主宰这一切的是政治团体及政府行政部门、大型公司与跨国企业,以及石油公司等。可以说,来自政府、企业和基金会的市场需求共同主导了关于中东地区的研究,他们使得对中东地区本土宗教的贬抑和种族偏见成为社会的“正统知识”,从而将自身从中东地区攫取利益的行为合理化。另一部分通过扎实调研来反映中东社会真相的研究成果却成为“对立知识”,不被政府基金所扶持,也极少为人所知。

最后,萨义德指明了最残酷的现实:关于中东的知识被西方话语体系主导,并藉由强大的传播机制在中东地区内部形成了“积极的赞同”,成为一种文化霸权。原本的中东地区复杂多元,包括众多教义不同、政权体制不同的国家,然而中东地区严重依赖西方的新闻通讯社作为新闻信源,缺乏自身强有力的传播渠道,只能“藉由西方制造的形象、历史与资讯来了解自身”^②。因此,面对西方的压迫和威胁,宗教标签反而成为唯一广被接受、名正言顺且能号召民众的主流意识形态。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中的主导力量都主动运用宗教标签来自我表达、寻求同盟。这种“双重约束”无形中延续了东方主义的“自我—他者”逻辑,不仅表现为对西方持续存在的妒恨,更表现为中东地区内部对少数群体的歧视与压迫,进一步强化了冲突与争论。当中东地区以宗教标签统一政治行动时,他们也沦为了“诠释共同体”的一部分,“所谓的东方人扮演所谓的西方专家指定他们要扮演的角色;西方人则坐实了他们在东方人心目中魔鬼般的形象”。^③

萨义德的剖析表明,整套西方文化的共识机制看似以客观的立场再现中东,实际却充斥着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恶性斗争。有关中东的错误知识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和传播,帮助西方巩固自身霸权。

萨义德提出的问题至关重要:西方媒体与专家究竟如何通过报道决定我们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理解?这背后仍然是知识霸权和文化霸权的问题。近半个世纪以来,萨义德的分析不断吸引着关心中东地区与全球南方的学者加入讨论。这些学者延续萨义德的反思路径,采用内容分析、话语分析等方法对全球媒体是否持续固化对中东地区的刻板印象展开实证研究。^④尽管有诸如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等西方学者不断对萨义德的观点及身份合法性提出质疑,但不可否认,这些争议共同增强了“反西方霸权”这一议题的可见性。

随着《东方学》英文原版、法语译本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以及《世界、文本与批评家》《文化与帝国主义》等后续著作的引介,萨义德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他不仅戳破了阿拉伯文学批评界对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西方理论的惯性依赖,为其提供了结合本土文化经验的分析工具;

① [美]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阎纪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② [美]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阎纪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71-72页。

③ [美]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阎纪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71-72页。

④ Sofia Hayati Yusof, et al., *The Framing of International Media on Islam and Terrorism*, European Scientific Journal, Vol. 9, No. 8, 2013, pp. 104-121; Paul Baker, Costas Gabrielatos & Tony McEnery, *Discourse Analysis and Media Attitud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Islam in the British Pr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Michael B. Munnik, *From Voice to Voices: Identifying a Plurality of Muslim Sources in the News Medi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Vol. 39, No. 2, 2017, pp. 270-281.

还复兴了阿拉伯文化中“反抗性知识分子”的传统^①。这种思想启迪刺激了大批阿拉伯知识分子的觉醒,形成了研讨萨义德思想的学术共同体,有效推动了该地区知识生产的“去殖民化”进程和“自主性”建设。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现代阿拉伯语和比较文学教授萨布里·哈菲兹(Sabry Hafez)指出,“萨义德最终作为一位‘向权力说真话’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其影响力超越了阿拉伯知识分子圈子,扩展到更广泛的受众,这或许才是他最持久的贡献。”^②对于中东本土社会科学家而言,萨义德提出的“东方学”和“反殖民主义”已经成为他们进行自主知识生产时不可忽略的重要理论内容。

二、萨义德悖论:多元文化主义的陷阱

借助新闻媒体如何报道中东这一现实经验案例,萨义德不仅揭示了知识如何被西方文化中的主导力量所扭曲,而且展示了非西方学者如何结合自身的历史、经验、文化来思考和解释世界。可以说,萨义德的探索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第三世界经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由西方主导的“东方学”的学术生产范式,可理解为一种“中东自主知识体系”。然而,这一突围的路径与最终结果同样暴露出后殖民批判在遭遇权力结构时的深层困境。

面对知识、诠释与权力之间的共谋,萨义德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理解中东地区所蒙受的苦难。一方面,他呼吁努力解除对西方叙事的依赖,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塑造自觉、强而有力的自我形象;另一方面,他给出了关于“知识”的全新理解方式:“应该从人性与政治的面向,将知识理解为某种必须去争取的事物,而且知识效力对象是人类和平共存与社会群体,而不是特定的种族、国家、阶级或宗教,否则我们的前景仍将黯淡无光。”^③这就是萨义德提出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寄希望于强势文化群体以人类和平共存为目标进行知识生产活动,谨慎诠释其他文化;另一方面寄希望于弱势文化群体能够自主表达,将真实多样的社会文化生活传播到国际场域中。这一方案的核心可概括为通过“对抗性诠释”的多元竞争来消解西方主导的单一霸权叙事,最终通过增进“理解”来缓和政治冲突。

然而,这一基于文化批判与诠释竞争的方案未能扭转现实中的权力逻辑。西方的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依然按照东方学范式诠释中东地区,“我们”与“他者”之间的对立冲突甚至因为美国“9·11”事件而愈发严重,在报道内容、叙事框架和语言表达等方面都呈现出“新东方主义”(Neo-Orientalism)的特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宏大的“反恐叙事”,原本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东方的印度、土耳其等倾西方国家被排除在“新东方主义”的地图之外,“其他”阿拉伯世界则成为新的关注焦点。^④与此同时,“新东方主义”的叙事者不再局限于欧美,还囊括了部分中东地区的知识分子和作家,^⑤后者作为所谓的“本土”权威信源进一步强化了中东地区内部的自我否定,加剧了其西方文明的矛盾冲突。

米歇尔(W. J. T. Mitchell)曾在萨义德遗作《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出版的学术座谈会上指

^① Sabry Hafez, *Edward Said's Intellectual Legacy in the Arab World*,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33, No. 3, 2004, pp. 76-90.

^② Sabry Hafez, *Edward Said's Intellectual Legacy in the Arab World*,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33, No. 3, 2004, pp. 76-90.

^③ [美]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阎纪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④ Mubarak Altawaji, *Neo-Orientalism and the Neo-Imperialism Thesis: Post-9/11 US and Arab World Relationship*,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 36, No. 4, 2014, pp. 313-323.

^⑤ Muhammad Abdul Wahid, *From Orientalism to Neo-Orientalism: Medial Representations of Islam and the Muslim World*, *Textual Practice*, Vol. 39, No. 2, 2025, pp. 162-181.

出：

萨义德的劲敌从来不只是在政治层面，更是在思想、文化和学术层面，是那种蓄意混淆与故弄玄虚的倾向，是对“专业”的盲目崇拜，无论表现形式是学术黑话，还是政策专家们的喋喋不休，是与之相对的、来自“专家名嘴”阶层的、以过度简化的“金句”所呈现的虚假崇拜，是诸如“文明冲突论”、“邪恶轴心”之类的简单化二元对立论，还是大众媒体“信息”中的还原论倾向。萨义德的盟友则是不故弄玄虚的复杂性，不陷入矛盾情感的模糊性，承认人类知识存在着令人困惑的局限，但同时不陷入蒙昧主义或寂静主义(quietism)，还是承认每一次言说都具有特定情境和偶然性，但同时不屈从于相对主义，也不牺牲那些恒久坚持的原则。^①

但事实上，萨义德所极力避免的上述错误思想倾向也恰恰构成他的理论困境。正是在与本质主义、简化二元论、还原论等东方学专家的“专业知识”的对抗中，萨义德也陷入了一种“相对主义”悖论，因为他将东西方的权力对抗错误归结为文化多元问题。在书中，萨义德认为所有西方媒体机构的中心共识“源出于文化，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就是文化本身”^②。同时，萨义德否决了个体直接接触及真理或事实的可能性，认为任何“真实的感知”都依赖于个体为自身塑造及从外界接收的诠释与意义，^③个体需要不断地质问“是为了谁、为了何种目的、为了何种原因，使得一项诠释在某种脉络中比在另一种脉络中更令人信服”^④。在萨义德看来，只要有更多元的关于真实中东地区的诠释，只要大众对于诠释背后的权力关系保持警惕，那么“我们”与中东地区之间的文化距离就可以缩减，进而缓解政治情势，增加和平对话的可能。这使其理论隐含了一个困境：如果所有认知都依赖于特定情境下的独特诠释，且不存在超越诠释视差的普遍真理，那么知识生产将不可避免地滑向一场无止境的诠释权争夺战，即西方有“东方学”，而东方有“西方学”，并最终走向一种文化相对主义。^⑤

文化相对主义否认普遍真理的存在，认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不存在可比较性和超越性的评判标准。^⑥ 在实践中，这种相对主义往往表现为多元文化主义模式。表面上，多元文化主义在教育思想、历史观念、文化批评等领域都强调增加对不同民族和族裔的文化传统的理解和尊重，试图打破西方文明的知识霸权。^⑦ 但正如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没有超越“自由主义式的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后者依靠“一元”的经济和政治文化结构定义“多元”。^⑧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则强调，新帝国主义正是利用多元主义文化策略对地方文化施行新殖民，多元文化主义从表面上看是尊重各

① 陈荣钢：《W·J·T·米切尔：〈世俗的占卜：爱德华·萨义德的人文主义〉(2005)》，载微信公众号“陈荣钢”，2025年8月6日上传。

② [美]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阎纪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③ [美]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阎纪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④ [美]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阎纪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页。

⑤ 王建勋：《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对美国秩序的冲击》，载《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2期，第48-67+123页。

⑥ 杨须爱：《文化相对主义的起源及早期理念》，载《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第107-119+126页。

⑦ 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第44-80页。

⑧ Peter McLaren, *Revolutionary Multiculturalism: Pedagogies of Dissent for the New Millennium*, Westview, 1997, pp. 296-297.

民族、各地方文化差异,强调文化交融,实际上却是为了实现全球文化的同质化和标准化。^①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带来“意识形态的终结”,相反美国以新自由主义为名推进资本全球化进程,构成了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霸权扩张。作为被定义的他者,中东地区至今没能摆脱诠释循环,与之相关的知识生产仍然由西方世界主导。从美国“9·11事件”到2024年3月的莫斯科音乐厅恐怖袭击事件,中东地区与“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标签牢牢绑定。^②由此可见,中东地区面临的并非简单的“被如何诠释”的文化问题,而是帝国主义和前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

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思考媒体和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无疑比萨义德从多元文化主义立场出发的东方学更为彻底。帝国主义理论暴露出西方知识霸权最根本的运作逻辑:为控制战略要地与能源资源、拓展市场、维护美元霸权以及转移国内阶级矛盾提供意识形态层面的掩护。在这套运作机制下,西方式普世价值形塑了许多非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的价值想象^③,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叙事被直接等同为“人类文明的核心”与“任何民族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东方学只是西方在推行普世价值霸权过程中旨在化解中东地区抵抗行为的特定学术产物。如果只是谋求破解东方学的学术生产范式而不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论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那么所谓对西方知识体系的反抗将变成制造西方知识霸权的共谋。遗憾的是,萨义德开出的解药复制了与新一轮资本全球化彼此配合的多元文化主义逻辑,导致他投向西方知识霸权的标枪在有力戳破西方话语虚伪面具的瞬间回旋击中自己,甚至因此成为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共谋,因此,萨义德无形之中在反对东方学的同时坠入到一种“自我东方学”的陷阱。

三、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镜鉴

萨义德的未竟之志提醒同样来自“东方”的中国学界:真正的知识自主性绝不能在西方预设的知识范式内部寻求只能提供同质知识增量的所谓多元文化诠释,而是必须从知识生产根源上批判西方文化生产范式的政治经济逻辑。当前学界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三重误区:其一,陷入非此即彼的“中西对立论”的思维陷阱。西方理论被简单贴上“西方中心论”的标签后进行彻底否定,而这恰恰落入西方预设的“文明冲突论”话语陷阱,导致无视西方理论中也有值得扬弃的人类文明普遍性成果。其二,“传统复归论”陷入历史错位的泥淖。该思路试图从晚清民国乃至中国古代学术遗产中寻找“经典答案”,却回避传统理念与现代社会治理无法直接衔接问题,这种脱离具体历史语境差异的考古挪用沦为一种文化符号拼贴游戏。其三,“去政治化论”将自主性窄化为对本土经验进行“纯粹技术”操作,这种方法论神话上的伪中立性实则回避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乃至斗争。上述误区交织作用导致学界呈现出“新瓶装旧酒”的怪象:高呼突破西方理论霸权却沿用西方知识范式,强调立足中国国土却在概念使用上陷入西方话语镜像反射。因此,必须首先确立中国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源自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史,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正是解决“脱钩”难题的关键。

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注列宁主义的启示。为什么是列宁主义?因为正是列宁正确揭示了资本主义从马克思所处的自由竞争状况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本质特征。与当时还流行的第

① [美]詹明信:《马克思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张京媛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17页。

② Bouchaib Benzehaf, *Covering Islam in Western Media: From Islamic to Islamophobic Discourses*,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s*, Vol. 2, No. 1, 2017, pp. 1-11.

③ 李慎明:《关于民主与普世民主的相关思考》,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第5-22+159页。

二国际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不同,列宁理论的彻底性体现在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创造性提出帝国主义论、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等新内容,成功指导了俄国十月革命。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使中国先进分子以无产阶级世界观重新审视中国的前途命运,推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使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也应运而生,一扫近代“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屡屡挫败。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得以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与矛盾,发动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力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是能够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先进理论武器,而且是中国知识体系真正实现“独立自主”的新文化自信源头。

这一“自主性”的奠基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与一系列思潮的交锋中得到鲜明体现。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曾就“中国往何处去”问题,与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展开“问题与主义”之争,与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有过论战,以及批判以黄文山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这本质上是关于中国道路不同选择的指导思想的争论。历史证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既能解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又能揭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与压迫的结构性根源。这使得中国先进分子跳出西方中心论的认知框架,不再从“文野之分”中审视中西差距,而是从被压迫民族和广大劳动人民立场出发,在世界体系与历史进程中重新审视中国革命道路,从而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启示在于,如今看似多元文化“共同繁荣”的全球知识体系中,一直都潜藏着阶级、民族和种族的不平等阴影;新自由主义思潮诱发的“去政治化”倾向始终存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不能仅从文化领域发力,更要在历史和世界的坐标系中正确定位中国,用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矛盾,以及与世界体系的复杂关系。

第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论新阶段》中明确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在我们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的伟大过程中,“中国化”本身成为“自主性”的生动体现,它意味着必须扬弃甚至包括列宁主义在内的一切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束缚,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照搬苏联“神圣化”经验的王明等人截然不同,毛泽东系统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特殊条件下如何夺取和巩固红色政权的新问题,开辟了不同于俄国革命“城市中心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从而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了旧中国,但更为关键的是中国也改变了马克思和列宁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毛泽东思想是继承并且超越了列宁主义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继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些思想均生发于中国大地,紧紧围绕着中国道路的现实问题,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相较于此,萨义德自始至终没能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回到中东地区的政治实践和日常生活,他理论上的呼号与当地的革命斗争不可避免地存在客观差距,这对于一个后殖民理论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此,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要真正理解“中国化”内涵,从中国的实践中来,到中国的实践中去,螺旋式推动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

第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时代课题与主要矛盾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毛泽东思想本身也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理论创新成果。进入新时代,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时代的创新提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它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其在价值取向、发展路径和文明愿景上,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理论模式的全面超越。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Walt Rostow)是西方式现代化知识体系代表学者之一,他认为历史文化传统存在显著差异的不同国家都要步调一致趋向西方式现代化的普遍发展道路,否则就会导致被他视作“病态”后果的暴力革命。照此逻辑中国革命沦为走西方道路起步失败的“教训”,^①显然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西方式现代化知识霸权,这一知识体系背后掩盖了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野蛮掠夺史。与之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超越西方以资本为中心导致的贫富分化;坚持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超越西方单一物质增长模式;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西方侵略扩张的旧路。从历史来看,毛泽东思想就有“四个现代化”的内涵,邓小平理论开创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从“三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阐述形成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理论体系。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有关现代化发展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不仅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更是惠及全人类普遍高度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创新模式。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时代命题,中国社会还有许多现象需要厘清,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除了要实现西方中心主义知识谱系的祛魅与超越,更重要的是重新挖掘根植于中华悠久文脉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和生态观,摒弃西方建立在侵略扩张历史之上的零和博弈观;努力在学理性研究中从“被叙述的他者”甚至“跟着西方叙述的次级叙事者”转变为具备自身价值观念和独立问题意识的“自我表述主体”。

四、结语

当前,全球知识体系仍然囿于西方中心论和全球资本主义框架,萨义德所言的“诠释共同体”仍在发挥作用。面对西方主流媒体在巴以冲突、“中国新疆棉”等舆论热点事件中的刻意偏颇,中国该向世界传递何种声音?正如王维佳观察到的那样,“几十年来习惯于按照全球文化建制派的价值理念来发声,已经让中国的主流媒体失去了自主性的历史坐标”^②,导致我们时常被动陷入西方主导的议题设置,更难以形成自主有效的“反向设置”。如今美西方国家还通过最新科技驱动的认知战继续将中国塑造为威权专制主义、人权问题尤为突出的“威胁者”和“破坏者”形象,在这种误导下,历史上的“中华帝国”也在重新成为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未来中国的狭隘想象,毫无疑问这完全有悖于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张。

^① [美]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郭熙保、王松茂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3页。

^② 王维佳:《危机时代的问题单:谈国际传播秩序的转变》,载《对外传播》2017年第1期,第9-11页。

那么究竟何为中国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学者夏倩芳指出，“学术自主性问题关系到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学术社群能够以何种知识准备、何种知识立场、何种思想境况，展开对于中国发展的重大方向性问题的建构性探索，关系到知识活动的总体目标和终极关怀”。^① 萨义德试图通过解剖西方视角启迪中东学术界努力建设自主性，的确呈现了西方媒体报道与传播体系背后的庞大权力结构和共识运作机制，批判了西方以“知识”为名对“东方”世界发起的意识形态战争。萨义德呼吁“从其他民族和其他时代自身的角度出发，通过理解、同情、细心的研究和分析而得到关于这些民族和这些时代的知识”^②，但他始终未能真正摆脱自身设置的“东方学陷阱”，在刻意强调东西文化差异、多元乃至对立当中陷入一种精心构造的文化相对主义困境，使他不得不以文化流亡者的姿态被裹挟进入新自由主义浪潮当中。

毛泽东所界定的“第三世界”有着特定的政治经济属性，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大国，是因为中国人民与广大亚非拉人民共同经历反帝反殖历史，因此，“第三世界”的知识自主性首先就体现为对任何知识帝国主义和学术殖民主义的自觉斗争。那么，对于具有乡土文化传统和第三世界属性的中国而言，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指导才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人民康庄大道。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是自主性的灵魂，离开马克思主义这根红线的任何所谓“自主性”只会导致失魂落魄。“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丰厚文化滋养。“两个结合”从根本上不同于萨义德批判“东方学”的文化多元主义愿景，后者虽然反映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内部学院派左翼知识分子的朴素道义，但这种脱离具体斗争实际的“合法抗议”依然囿于新自由主义表面多元化实则不平等的弹性统治逻辑，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自主问题。因此，我们讨论萨义德不是为了否定他为探索中东知识自主性所做出的努力，而是从全球南方交流互鉴角度提醒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自觉避开思维陷阱，进一步认识到“两个结合”提出背后蕴含深厚的历史逻辑，进而为建构真正具有新时代意义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共同努力。

(下转第 126 页)

^① 夏倩芳：《建构一种积极的学术自主性——兼论学术自主性与知识体系自主性的关系》，载《社会科学文摘》2025 年第 4 期，第 21-23 页。

^② [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第 3 版），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版，第 6 页。